

我们像两个诗人那样谈起了世事。我说：“我寻找一只青鸟都快寻找了一辈子了，也没找到。”牧羊人说：“这和我岂不一样？我放了一辈子的羊，可这无数的羊里没有一只是我的。”我说：“这不一样啊。你瞧你每天都守着羊，羊是你的和不是你的有什么区别呢？”牧羊人乐和了，说：“这么说的话，你那只青鸟不也每天都在你的心里飞来飞去的？你找到它和找不到它又有什么区别呢？”

《青鸟》中的这段对话，可视为通向海勒根那艺术殿堂的幽深小径。沿着这条瑰奇浪漫又弥漫着寻根气味的

小径前行，可以感受到作家艺术殿堂里供奉的宙斯女神灵动繁复的面影，她自由穿梭往来于历史与现实、时间与空间、异界与人世、族群与文化间。在精心结撰的故事和煞费苦心的隐喻中，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将亘古的民族历史和时代新变杂糅变奏。在这些文字中，圣祖的骏马、花刺子模的英雄、嘎达梅林的坐骑、骑手嘎达斯的魂灵等这些遥远的传说及昔日的英雄倏忽而至，而在庸常现实中沉默隐忍的亲友们则在某一天突然幻化远遁，他们隐匿在时间深处或人间秘境里，进而开启诗意和理想的栖居。

由此可见，海勒根那的小说集《骑马周游世界》的叙述风格和语言风格具有典型的神话思维特质。在汪洋恣肆的想象中，历史、民俗、世事、传说被熔于一炉，小说中的人物在寻找自我和追求理想的同时，亦实现了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追慕和回归。于是，远遁与寻找成为这部小说集尤为重要的叙事策略和结构模式。

譬如，在《父亲鱼游而去》中，长着青蛙脚的父亲被洪水带走后，母亲不承认从河里捞出来的尸体是父亲，她带着年幼的“我”日夜不停地找寻着父亲，并在居住的窝棚里支起了大锅，与幻化成鱼的父亲亲密地交流闲谈。小说的结尾，干涸的大河重现人间，父亲也终于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大河里。与之相似，在《寻找巴根那》中，哥哥巴根那在粗砺贫乏又屡遭打击的生活中与羊群一起神秘地失踪了。为了找寻哥哥，“我”和堂哥费尽周折，在充满奇幻和诡异的旅程之后，终于在一片水草丰美的草原上发现了哥哥与羊群。此时，哥哥变成了一只“黑脸白身的矮羊”，他似有千言万语想要诉说，但终究只是“领了羊群向远方浩荡拥去”，目睹这一切，百感交集的“我”

2020年，人们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搅乱了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浮躁、焦虑的情绪所困扰，而张秋铤以作家的定力写诗作文，并沉下心来，梳理旧作，创作新篇，汇集成《东湖洼之晨》小说集。集子选录小说24篇，内容涉猎农村、城市、部队、医院、家庭等题材，展现了南北地域风情，描写了各色人物，内涵丰富，色彩鲜明，感情细腻，语言灵动而有张力。

张秋铤于1968年开始发表文章，1979年专业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400万字。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园中情》《抗日名将张自忠》《太阳半张脸》，中篇小说《烟雨南运河》，传记文学《走向和平》，文化随笔《贯通一生的心理手册》。1995年首次出版《抗日名将张自忠》，20年后再版，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为该书题名“捍疆卫士”，其作品生命力、影响力在当下文学界实属少见。有人称之为“张秋铤现象”，当然更多的是指他年过古稀仍保持旺盛的创作力，笔耕不辍，佳作频出。2019年出版长诗《涛声回响六百年——钓鱼岛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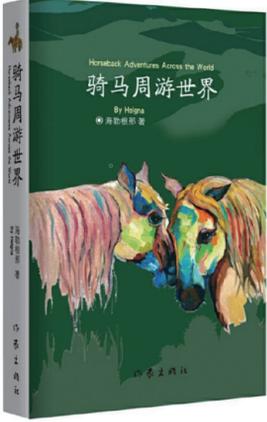
短篇小说《东湖洼之晨》是作者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当时被全国各地小说杂志相继转载，河北省电视台改编成电视剧《晨曲》。时隔多年，天津作家武歆在张秋铤作品研讨会上谈到其创作特点时说，《东湖洼之晨》与当下的作品相比，一点也不落伍。是的，一部反映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青年敢于追求富裕美好生活、大胆创业的故事，缘于作品独特的叙事方式与描写手法，被人们长久记忆。作者将该篇为小说集命名，有着纪念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农民勤劳致富的劲头没有变，乐观向上的生活基调没有变，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向往没有变。一篇文学作品围绕国家发展的大主题，以丰厚的思想性、较强艺术性，为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和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作注解，这应该是文学艺术的现实意义。《边鸟》以新颖的视角，描写国境线两边两棵树上的两对儿鸟，与树下驻扎的两国哨兵的跨越“国界”的生活。通过对自然界无意志、无思想的树与鸟的依附、鸟与鸟的聚散，描绘出自然和谐的场景。作品以文学艺术的内涵呈现人道主义、呼唤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生发出感人的力量。作者用评论家刘乐群对《边鸟》评判的信，作为小说集的序篇，十分恰当地概括了这部小说集的创作艺术特点，“刚笔见气魄”，“柔笔出神韵”，其格调与各篇风格一脉相承。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个个哈姆雷特。我读《东湖洼之晨》小说集，读出了张秋铤的小说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以及浪漫的现实主义底色。作者在叙事中大开大合，以刚健的笔锋切入时代，切进社会深层、底层，在小切口处展露作家大胸襟。作者时时保持敏锐的感觉，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既有前瞻性的预判，又有对事态时事的深刻思考。作者在文学创作中以关注时代发展、社会矛盾和民众生活为命题，担当文学创作的责任与使命，思索、探讨着人性的、思想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在作品中植入国家故事、时代话题，表达内心的情绪与愿景，形成一部部、一篇篇文学作品，引发读者共鸣。其大情怀、大格局的浪漫主义底色显现其中，让作品精神不

海勒根那《骑马周游世界》

远遁、寻找与世事

□乌兰其木格



则与众人跟随着羊群离去的方向继续在茫茫未知的草原上寻找。在这类小说中，无论是长着脚蹼的父亲，还是变成头羊的哥哥巴根那，他们均具有某些非人的特质，恰是由于这些怪诞使得人物成为族群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隐喻和象征。

海勒根那曾在创作谈中说：“一种血脉的寻根，一种民族情感的苏醒，一种文化认同的溯源，让我深深沉醉在这片沃土高原。”《骑马周游世界》的复古觅根、对异人物故事和地母文化的

提炼提取，使其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实现了恰到好处地交融。作家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返回远古并在理想家园中自由栖居的生存愿景。由此，远遁和寻找显现出蒙古族人对于天地一体、万物谐和地追慕，以及对文化根脉的无限贴近。

尽管作家深情眷恋远古自由蛮强的生存方式，但他并没有回避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间的巨大沟壑。远离尘嚣的边地和超功利的生存犹如镜子般折射出当代生活的某种缺失。现代化携带着一体化、标准化和同质化呼啸而来，白色的蒙古包、辽阔的大草原、马背上从容的牧人和繁星般的羊群渐渐逝去，取而代之的则是整齐划一的定居点、沙化荒化严重的稀疏草场、圈养的瘦弱呆钝的牛羊和再无纯种蒙古马可骑的荒凉现实。小说中，当年轻的“我”作为圣祖的子孙欲图骑马周游世界时，却在三天后灰溜溜地回到了村庄里，因为“外面的世界已经无路可走了！庄稼地连着庄稼地，草原都有网围栏，城市除了机动车就是斑马线，我们骑马根本周游不了世界了……”（《骑马周游世界》）时移世易的同时，人性和人心也发生了异变。为了金钱实利的获得，人们不再遵循自然伦理和大地信约，树林被乱砍滥伐、草原被肆意开采、猎人不再遵循规矩，贪婪打破了所有的禁忌及对大自然的敬畏。

远古与现代同构并存的书写，显示出海勒根那对人类发展史面临的悖论和困境的体察。作家以哀婉焦灼的文字揭示出失根状态

后人的悬浮无依和无言痛苦，表达出对工业文明异化人性的警觉，以及对于拜金主义的拒斥和批判。为此，作家将传统文化岩层重新激活，将那些顺其自然、本乎天性的生存观念和浪漫故事重新讲述，进而阐释、针砭或解决当代文化和日常生活中那些困缚我们的基本问题。基于此，海勒根那的绝大部分小说都有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尾，如伯父特木热终其一生的愿望是守着草原和艾敏河，他希望死在河里并把尸首喂鱼，这样他的魂灵就可以附到鱼身上，从而永远与挚爱的河流和草原在一起。然而，酒醉的伯父还是死在了岸上，但懂得他的鲑鱼钻到伯父的坟地，帮助他实现了心愿。又如朝鲁校长和他所造的木马失踪后，每到雨季“一匹精灵般的白马总会闪现于荒无人迹的沙原里，它浑身无一根杂色，四蹄黑如发墨，形体修长而丰腴，鬃毛如飞扬的浪花，它被无数的闪电照亮，又被漆黑的雨夜淹没”，这匹精灵般的白马，就是蒙古人世代相传的神驹。此外，被杀害的鄂伦春猎人吉若变成了六叉角的公鹿（《六叉角公鹿》）；白狼马则带着它的主人嘎达梅林回到了富饶而丰美的科尔沁（《白狼马》）；找到青鸟的“我”终于与坟墓中的母亲幸福地重逢了（《青鸟》）。在这些作品中，现实生活中卑微而困苦的小人物寄托了世事的烦忧，以旺盛的生命力和愉悦欢脱的面影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中。

诚如玛萨姥姥曾说过的话——“人类是不能敲开所有的自然之门的，有些门要永远关上，永远不能打开。”（《把我送到树上去》）自然的堂奥幽深晦暗，人类的经验与知识尚不能勘破所有的秘密。当贫乏庸常的生活令人难以忍受之时，作者便以瑰丽的想象将宇宙的自然奥秘一一打开。于是，人、草木、鸟兽在无限的眷顾中自由转化并相依相偎，在这个隐秘的世界中，万事万物如水流花开，安时顺命地自然开合。

可以说，《骑马周游世界》这部小说集质疑了现代性无往不胜的神话，改写了进化论的时间观，乃至改变了自文学革命发生后启蒙话语和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刀锋般的现实逼视以及对民族文化的深度掘进，海勒根那笔下的世界迷离彷徨，显露出无限的可能性。在倾情讲述民族的前世今生时，他提示我们扎根的重要和可行性路径——只要“青鸟”在心里飞来飞去，便可灵魂落地，便可八风不动，便可此心安处。

宋朝诗人陈必曾在《汤泉》一诗中感叹：“难将人力营力胜，须信天工造化长。”汤泉，是上天送给人间的一件神奇的礼物：不择地而出，汨汨滔滔，清清亮亮，又有着绵长的温暖。刘致福生在胶东文登，“家乡的温泉都是地表泉，真如泉水一样，从地表岩间汨汨喷涌而出”，自小在汤泊汤泉中泡大，更因浸润着先人们歌享自然、融汇自然的汤俗文化中成长，他创作出的散文也一如神奇的汤泉，清亮、温暖，有着独特的魅力。

读刘致福的散文，感觉到他能操持多副笔墨，他的文字是有些文艺范的。他喜欢海边咖啡店门口小诗《一杯沧海》中类似的文字：“每个人都是一只杯子，/只是杯子的大小不同，/有人只装着自己，/有的装得下一片汪洋。”他能写《济南的春天》中类似的文字：“趵突泉灯台的余辉还在闪烁，千佛山上的蜡梅已经绽开了娇艳的嘴唇，阵阵幽香随风浮动，搅得半城人心难安宁。”文字中有一种灵动的秀气。“几场小雨，天空被洗刷得格外干净、清亮，雪白的云朵在湛蓝的天幕上层次分明地飘移，燕子呢喃着从很远的南方飞回来。”（《端午午节》）文字极为讲究，用笔细腻，色彩高亮而又蕴藉，在精雕细琢中激发文字的味道，很有些经典散文味道。他重视语言的节奏，比如，好用短句，重视短句与长句的相向，有着近代理论家顾随所说“一读便好”的追求，能让人嗅到汉字的馨香。这种感觉在他近来的文字中更加突显，此前的作品时不时还能看出杨朔等人作品的影响，如常常会以文学性的语言卒章显志——“马里兰的夏天很短，只有不足四个月，和她还没有更深的交流，她便翩然而去；马里兰的夏天也很长，她会永远留在那些热爱她的人的记忆深处。”（《马里兰的夏天》）。但这样的文字，在他近来的作品中越来越少，灵气不外露，词锋更内敛，这或许正是一种成熟。他的散文，如储福金小说《黑白》中的梅若云：“脱俗，清丽，洁净。”他珍视文字，尊重文字，用笔节俭。

刘致福“雅洁”的文字是经过了的“淬火”炼成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钟情于小说，颇得“先锋”的感觉，那是要把人心深处的罪恶“抓”出来，以牺牲阅读的愉快作为代价，以对人性恶、潜意识的罪的获取作为报偿。在他的散文中，也会偶尔“用力”一下，如《戏台》写一位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头后挽一个髻的地主婆，不堪受辱上吊自杀，这其中还能见出先锋性小说的痕迹。但更多的是归于平常的生活。这有些像武侠小说中的大侠，打打杀杀、腥风血雨之后，做了个平常人；但自然与平常人的“平常”又有着不同，这平常似乎也有着极不平常的意味。从负重而行，到“极快乐”的书写，他的散文中透露出“风行于水上，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止”的乐趣。这就像明清时代的文人张岱在《琅嬛文集·鲁斋庵庵》中所说：

刘致福散文

一池清亮、温暖的汤泉

□孙书文

未来，未来的‘鱼肚白’永远那么神秘迷人。”也正因为怀抱这份“希望”，他感觉不到“艰苦”：“记得我们将雪被掀掉，从雪底下来压在被子上的衣裤，掏出来刷牙咧嘴地穿上，丝毫没感到多么艰苦，倒似乎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希望的光亮》）这段话文字，动作连贯，一气呵成，映射出生活的真实，更重要的是文字突破了语言本身的力量，能体味到这是在作者心中反复酝酿、让自己感动的一种体会，是感受过的“近乎圣灵的光亮”。这是刘致福散文这一汪汤泉的热力源。

从发表作品的频率看，刘致福的写作是很“上手”的，他是写作的“乐之者”。在一团乱麻的成人心理境里，写作带给他愉悦。写作，就是他的自我救赎。他靠文字，“穿越世俗的走廊”。何谓“穿越”？自然不是沉迷，但也不是舍弃，不是独往独来，不是完全的超越，是带有距离的警醒，是怀抱同情与温情的体谅。像是《穿越世俗的走廊》中所写，朋友老B痴情于办公室与住所间的天然的绿色走廊，欣赏四季无限的风光，“办公室里的琐碎烦恼，城区与路上的喧闹嘈杂即可无影无踪，令人不自觉地有种换气的感觉，吐纳代谢，似乎从这里走过去，那个人又变成了一个‘新’我”。写作便是他的“换气”，吐故纳新，日日常新。

尊重生活，遵从内心，“每一个字都渗透着生活的阅历与沧桑，都蕴藏着人生的感悟与智慧”。刘致福将文字“泡”在生活之中，他的生活又自自然然地“流溢”成文字，自有着格外动人的力量。

徐一洛《山那边，有光》

有温度的时代书写

□庞白

中国文学正在进入非虚构书写的时代，纪实文学写作对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在精神上要有自觉的使命、责任与担当，行动上要走出书斋，快捷、有力、主动介入现实。近年来，脱贫攻坚题材的纪实文学中涌现了大量优秀作品，作家们以沉浸式的体验及“田野调查”式的访谈深入脱贫攻坚现场，在一线敏锐地捕捉时代新气象。徐一洛的《山那边，有光》就是这样一部以书写广西贺州土瑶族地区脱贫攻坚故事的纪实文学作品。

有精神温度的地方志书写

脱贫攻坚题材的纪实文学是新世纪以来备受瞩目的非虚构写作。作品以具体的人、事、村庄或乡镇为书写对象，作家不仅以时代书记员的身份记录下此地发生的历史转变，还要从一村一地的脱贫实践中，写出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作家们不仅需要纵深开阔的历史视野，还要有俯身大地的人文情怀，在宏大中细腻地洞察凡人小事，生动地刻画，体现具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人物形象。

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山那边，有光》，作家徐一洛从都市舒适的环境去到条件艰苦的乡村，在贺州土瑶族人生活的沙田、鹅塘两镇下属的6个贫困村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面对一个个村庄、一片片土地，听村民口述一个个鲜活故事。作家因乡村的苦难往昔流泪，更被农村这几年的大变化和感动。如何将这些凡人的日常故事转化成文字，给阅读视野开阔的读者群体很好的阅读体验，实非易事。作者的选择是，在对这些人物的书写时植入一种“雄心”来赋予它更深广的意义——像书写“地方志”那样，呈现这个地方的历史方位，铭记那些在改变命运的过程中勃发出生命之光的人。

《山那边，有光》由十几个真实的乡村故事组成。不论是靠种植生姜、茶树脱贫的明梅村，还是以绣绣脱贫的金竹村，又或凭借强大毅力修成公路而脱贫的狮东村，他们村里发生的故事，在全国脱贫路上一定都有千千万万相似的已发生或者正在发生，但对于沙田、鹅塘两镇的土瑶族人来说，这些可能看起来不那么轰轰烈烈的事，却是个体命运得以改变的巨大开始，这对他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故事、每个家庭、每个家庭的调查、访谈后，尽量摒弃带有故事趣味性的记录和书写，使本书有了有学术性的“地方志”和颇具史料价值的文学作品。

让真情自然流露的书写

在谈这些扶贫脱贫的人与事时，能清晰感觉到徐一洛在努力地克制修饰辞的使用，有意让文字呈现出最朴实的质地，甚至可以说是去技术的“裸写”。虽然如此，但仍然可以看出，这些凡人小事凝结着作家对笔下人物炽热的情感。

有个故事写到20世纪90年代，村支书赵转桂当年为了能建自己村的村小，不用走十几里山路到邻村上，刚刚二年级的他“毅然用稚嫩的肩膀，从老龙冲的土窑往村里挑砖，一

张秋铤《东湖洼之晨》

浪漫的现实主义底色

□殷秀玲

落伍，能够常常读新。《啊！明云》主人公是一位地主阶级出身的“娇小姐”，她背弃出身阶层投身革命，成为追求光明与理想的红军女战士，最终却被“改组派”夺去鲜活生命，熄灭了青春的火焰，读来仍为“时代病”吞噬生命而唏嘘不已。（《小兄弟与洛曼大哥》）描写小红军在掉队路上结拜汉藏两族兄弟的民族团结故事。《谛听女儿脚步声》关注新冠肺炎病毒严峻形势下的白衣战士，讲述同为医务工作者的两代人，关键时刻以仁心仁术，患者至上，白衣执甲，不惧风险的精神，演绎出平凡人的英雄主义。

每一个成功的艺术家都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张秋铤出生于江汉平原，从军数十年，旅居北方多地。在荆楚文化的滋养和燕赵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南”婉约“北”阳刚集于一身的性格特点。走南闯北的人生阅历，铸就了他乐观向上、心有气象、存天地之浩气的宽阔胸襟。这对一个作家创作而言，作品必定体现出“我”在其中，引领读者深入到作品中去感受清新的格调、活泼新颖的叙事，足够的作品中鲜活健康的阳光人格，品读出十足的生命张力和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纳入小说集中的作品，从各领域的各色人物看，无论大人物还是平凡普通人，无论命运如何，他们身上都闪耀着不屈服命运、奋发追求人生态理与价值的光。大人物身上自有英雄气，小人物也能活出群像中的坐标，散发人性良善的魅力。总之，整部作品叙事格调昂扬激情，语言崇尚唯美，感情细腻舒展，婉约中释放浪漫主义色彩。是的，一个作家思想抵达的地方有多远，作品的内涵就有多饱满，人物生命力就有多旺盛。

现实主义思想底色隐于心理活动。小说创作的心理嬗变也是一个作家自然发展变化的过程。张秋铤在创作设计与构思中，观察、感受、认识社会改革进程中人们的生活百态与百态人生，涉猎的题材虽广，但塑造的所有人物都拥有健康的人格、昂扬向上的精神和家国情怀，努力让生命精彩绽放。他们的心理始终是开放性的，没有悲感、阴郁和丑陋。《新来的护士周萍萍》描写了年轻的小护士对待伤病员细致周到的护理，当得知父亲在狱中亡故的消息，她抹去眼泪，面对现实，坚强地走向自己的岗位。农村村上的打工妹阿珠，丈夫进了监狱，她独自抚养孩子，做点小生意，等待丈夫早日归来。《法令》和《生命的张力》等篇都是描写下岗工人自谋生路，艰苦创业，甚至被输送到国外做劳务，仍不等不靠，昂首做人。他们是一群不屈服命运的普通人，是社会改革进程中被时代冲撞的小人物缩影，不管命运如何，都挣扎着活，做最好的自己，读来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短篇小说是生活的横断面，从小切口处去记录时代脚印，抒写国家与社会宏大题材中的小故事。这部小说集中的作品创作时间跨度大，但反映的主题思想均是主旋律。我们从这些作品中不难找到一根脉络，那就是作家的精神走向，即作家的世界观和精神色彩，渲染着浪漫的现实主义思想底色。当读者深入作品，密切与各色人物神游交汇时，相信在你的眼里已然呈现出一片张秋铤的“文学世界”；感受到总有那么一束光，始终明亮在七旬老作家的心中。

次挑4块，一挑就是好几个月。每挑一趟砖，他都要步行好几公里。”以虚构见长的小说家也许可以此为素材，虚构出种种感人的细节而完成一个令人潸然泪下的精彩故事，但徐一洛只以白描的手法记录了当时的情境。作家从话语中心位置后撤，并剔净修饰装饰的华美光环，也不进行判断，只如实地记述事情，哪怕这样的记述显得有些粗砺拙笨。

体现真实的情感，打动真诚的内心，呈现“原来的样子”是很有效的书写方式之一。因真实是非虚构写作最核心的要素。

为凡人琐细书写的中国故事

脱贫攻坚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脱贫攻坚题材的文学作品一方面记录大背景下某地发生的历史变迁，另一方面也记录了为这个变化而努力过、奋斗过的人，包括普通村民和扶贫人员。在第二点上，徐一洛较充分地体现了女性作家细腻的人文关怀和文风，书中有大量故事是讲述草根人物通过自身努力而改善自身生存环境的。如凤增贵一家的事。十几年前，凤增贵结婚时，亲戚都到齐了，眼看土瑶族特色的婚庆长桌宴酒就要开始了，可凤增贵却是开宴前才求完东家求西家，从邻居处借够猪肉、酒、米、油等方得以顺利成婚，而今他们靠自己努力做生意，不到三年的时间，便把70多平方米的泥土房换成120平方米的楼房，从贫困户变为小康之家。

脱贫攻坚工作中，驻村干部的付出是不可小觑的，徐一洛当然没有忘记将笔墨留给他们。她写了狮南村的干部赵万兴，多次赴村途中遇险，但丝毫不影响他扶贫的成绩，他“签订租赁土坯房12户，整治拆除木板危房26间，新建土瑶特色木板房10户28小间，示范区项目得以顺利推进完成。”而韦连军的遭遇更加令人唏嘘，徐一洛一反此前的白描手法，描绘了大量细节：“……那时还没有水泥路，半路遇到塌方，约有几十米长，下面就是100多米高的悬崖，人只能从塌方的地方走过……看看下面的悬崖，他感觉自己的人生可能就走到这里了。那靠在塌方的差不多90°的泥石上，根本不敢动，后来来了两个村民，一前一后，前拉后推，才勉强把他带过去。走完这几十米，韦连军感觉就像走完了一生，全身冷汗直冒。”另一次更为惊险：“……在一个叫石梯的地方，因为连续拐弯，又下着雨，在一个急转弯且上坡处，官帽稍微一加大油门，摩托车便开始打滑，车头翘了起来，直接被前面百米深的悬崖冲过去，韦连军从后座上紧急跳车，顾不得手机和提包掉到地上，死死地拉住摩托车车尾，在摩托车前轮已经有一半掉到悬崖边的时候，拉住了车子。两个人算是侥幸保住了性命。之后，每次经过那个地方，韦连军依然心有余悸。”文本中还特意附上了解冰、谭志勤、彭达峰、凤接转等干部完整的驻村工作日记，让细节更为真实可信。

脱贫攻坚是时下重要的创作题材，作家关注时代，书写时代，以文学的温度与魅力构筑时代，任重道远又值得期待。《山那边，有光》显然是脱贫攻坚题材中一部有温度、有魅力的作品。